

风物 深度

岑学敏：台大大一国文必修要废除吗？香港与英国经验来看



2022年4月4日，国立台湾大学，学生拍毕业照。摄：陈焯辉/端传媒

2022-04-05

台大 教育

去年，国立台湾大学（台大）学生会推动“国文”（大学本科必修中文科）改革事宜，建议废除其为必修科，并改为通识科；而负责开设“国文”的台大中文系则认为，必修有其必要性。这争议由来已久，而且不

由于台大一网络上有2019年前后已有相关呼声

三四年间，又掀起数波讨论。其中，赞成改革的一方大致认为，“国文”必修科的设计，偏重古文及中国古典思想，与多元教育的理念及学生修课致趣不符，有学生代表亦援引台湾其他大学的改革经验，认为现在的“国文”应从必修，改列为选修的通识课；支持保留“国文”必修的一方则多认为，“国文”科能够确保学生的中文语文能力，并指该课能够培养学生的文化思维、文化素养和思辨能力等，不可轻言废除。同时，亦有论者视台大“国文”必修论争为台湾基本教育课程纲要（课纲）改革论争之延续，该论点认为，现在高中教育删减了过多的文言文，需要在大学教育中把相关教育补足回来。

在台大“国文”科的“存”、“废”问题背后，牵涉的远超于一间大学的学科必修选修事宜，更涉到语文教育在大学的角色、语文教育和文史哲教育的关系，以及大学如何达到全人教育（holistic learning）等事。笔者在香港接受教育直到硕士，大学本科、硕士皆毕业于港大文学院，并曾在台湾的国立大学任教。港大与台大的本科教育，皆有语文必修课；我希望透过香港、台湾两地之间的经验比较，探索未来之路。

同一学期同一课号：内容却可能不同？

以学生合理期待的角度而言，同一学期同一课号课名的课，由不同老师任教，预设会有教学方法和风格上的差异，但一般不会预设内容、评分标准上有太大的差异。现在台大的“大学国文”类型科目，则与此种合理期待有所距离。

台大的必修“国文”科由台大中文系负责，分为“大学国文：文学鉴赏与写作（一）／（二）”、“大学国文：文化思想与写作（一）／（二）”及“大学国文：阅读与写作（一）／（二）”，所有本科生皆需要修习一门，已满足毕业“国文”学分的要求。表面看来，台大的本科生是要在这些“大学国文”科目中六选一，而且当中都有涵盖写作；但实际上，每一门“大学国文”科目都由中文系的授课老师按其专业领域设计课纲，换言之，即使在同一个月学期同样选读“大学国文：文学鉴赏与写作（一）”的学生，也可能因基于授课教师不同、而上到内容完全不同的课。

例如，以现在于台大网站找得到的课纲看来，同一学期修读“大学国文：文学鉴赏与写作（一）”的学生，会因授课教师之不同，有人在课程中修读汉语古典诗歌，有人在修读晚清与民初之际的文学，有人在修读“疗愈读写”，有人在修读华文文学与电影中的性／别课题。而这些种种不同内容的科目，在一般的课程编排上，不会在同一个月学期以同一课号课名出现，而是有独立的课名课号。

以学生合理期待的角度而言，同一学期同一课号课名的课，由不同老师任教，预设会有教学方法和风格上

的差异，但一般不会预设内容、评分标准上有太大的差异。举例来说，在香港的大学，一般都有导修课（tutorial），同一科目会因人数关系由不同的助教（teaching assistant）或导师（tutor）负责带领导修，彼此间带导修的方法或有差异，但学生不会预设导修课的内容会基于导师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异，而为了平衡导师间的评分，一般还要开会协调一致的评分标准，以示公允。现在台大的“大学国文”类型科目，则与此种合理期待有所距离。



2022年4月4日，一间书店售卖国学书籍。摄：陈焯輝/端传媒

写作 vs 学术写作训练

就台湾的中学教育和作文侧重抒情文以及文学的美文传统而言，台湾的学生非常熟悉抒情文体，但相对来说缺乏的，是论说的能力，以及对学期报告与学术文章写作的要求。

就写作而言，台大的“大学国文”亦因科目与授课教师的差异，对写作的涵盖程度及内容有所差异，侧重点有所不同，有人会重视抒情文、描写文，有人会较重视论说文，有人会把焦点放在学术写作。就全校必修

的中文科而言，我以为其写作教育的目标需要符合其他教师的合理期待，例如可以让学生懂得如何书写学期报告 (essay) 与学术文章、辨别资料的能力、学术文章的规范、征引格式等等。

就台湾的中学教育和作文侧重抒情文以及文学的美文传统而言，台湾的学生非常熟悉抒情文体，但相对来说缺乏的，是论说的能力，以及对学期报告与学术文章写作的要求。网络上不难找到，台湾的大学教师批评现存的中小学教育作文训练，使得学生缺乏书写论说的能力，简而言之，不懂写essay。以教师的角度而言，不管哪一个科系的学生，都需要懂得论说，写学期报告和学术文章、知道基本的规范和格式要求，这些都是学生需要时间学习，而个别专业科目的教师在实务上无法去花很多时间教导的——这就需要全校的必修科的时间和资源。例如，就算香港学生在高中考试已经大量书写申论题，上了大学仍需要学习学术文章的风格与引用格式。

然而，以现在台大事实上的必修中文科“大学国文”来说，只有部份教师有针对学术文章书写作出讨论。以现在台大的选课规定，则代表著当中会有好一群学生，在大学本科教育当中，没有受过学术写作的训练，或者学习时数不足。如果在必修的中文课并没有得到充足的学术写作训练，那必修的英文课呢？答案亦是肯定。以找到的课纲来看，台大必修的英文课，比较是综合型，补足读写听说的一些训练。

于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情况：台大必修的语文课并没有完全符合合理期待，即训练学生应具备的语文能力，包括应付大学学习必要的写作要求，而作为必修中文课的“大学国文”，其内容则比较像是开放给全校选读的专题课。

语文课并不一定是大学的毕业要求，譬如英国不少大学，皆没有把语文课设为必修科，更没有必修的英国文化或文学课，但部份大学的语言中心则会开设学术英文课程，供学生选修；另一方面，不少英国大学都有设立正式开学前的语文课，供国际学生额外报读，以增进学生在学术英文上的读写听说能力，准备其课堂所需。





2022年4月4日，国立台湾大学。摄：陈焯焯/端传媒

台大的必修中文课与港大的必修英文课

从港大的制度可见，针对全校的语文课程，会交由专责语文教育的教师团队负责，而非中文学院本部或英文学院以文学、历史、文学与文化理论为专业的教师负责，并且以实用与学生学术语文能力为中心。

和台湾相类近，香港大学则有必修的中文与英文课，亦有一定的跨学科学分要求。由于港大的官方语文是英文，我以为值得和台大的必修中文课（大学国文）两相对照的，是港大的必修英文课。所有港大的本科生，除了所属学系学院的科目外，必须要按照其学院要求，修读由英语中心（Centre for Applied English Studies，而非英文系）按照其专业领域设计开设的学术或技术英文、由中文学院辖下“中文增补课程”所开设的实用中文，以及由一定学分的外系设计的跨学科核心课程（Common Core，可以理解为台湾“通识”一类课程）。

英语中心是一个独立的部门，除特殊豁免外，港大全校的本科生都需要在第一年修读准备学生在全英语授课的大学环境学习的“大学英语”（Core University English），内容涵盖学术内容的阅读、书写与汇报、学术资料的搜寻与应用，并让学生了解学术诚信的意思以及如何防止剽窃(plagiarism)；之后，学生需要按照其专业背景，修读英语中心相关的科目，例如：文学院、社科院、教育学院的学生需要修读“学术英语”（Academic English），建筑学院与商学院学生需要修读“学术沟通”（Academic Communication），工学院学生需要修读“技术写作”（Technical Writing），而因应不同科系专业背景的学生，其需要修读的相关课程课号、名称皆有所不同，在内容选材上亦各有所侧重。

港大毕业学分要求的跨学科的核心课程则会涵盖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中国研究、全球课题等四大范畴，由不同学院学系的老师开设以全校本系外的本科生为目标的课程，学生需要在不同范畴的科目各选修最少一门。在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文学、文化、历史，开拓学生人文视野的课程，譬如：有中文学院教师开

设的“中华帝国晚年的西方印象” (Ideas and Images of the West in Late Imperial China)、英文学院教师设计的“文本与影像中的英帝国” (The British Empire in Text and Image)、哲学系教师讲授的“中国思想中的人文与自然” (Humanity and Nature in Chinese Thought)、比较文学系教师负责的“全球视野中的香港电影” (Hong Kong Cinema through a Global Lens)、理学院不同学系的老师合授的“科学中的女性” (Women in Science) 等，皆能丰富想像、开拓学生人文视野，并且是能够吸引外系学生的科目。

从港大的制度可见，针对全校的语文课程，会交由专责语文教育的教师团队负责，而非中文学院本部或英文学院以文学、历史、文学与文化理论为专业的教师负责，并且以实用与学生学术语文能力为中心。至于文学作品阅读、文史知识等，则是个别学院学系的选修科以及核心课程范畴。



2020年2月，国立台湾大学。摄：陈焯辉/端传媒

可以分拆独立团队？

我认为，台湾的教育需要认真区分语文教育、创意写作、翻译与文史哲专业——彼此皆具不同范畴，不应混淆。在英语国家接受教育、研究英语文学与

这些自诩为“文化理论”的研究者，不代表其自动可以训练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

参考这一种划分方法，我认为台大必修中文科和必修英文科可以分拆独立团队，由专门负责语文教育的部门或教师负责，内容则应该要针对大学生应具有的语言能力，包括学术资料阅读、运用与汇报、学期报告与学术写作等方面，以及为其毕业后所需具备的沟通能力作出教育；至于，现在“大学国文”当中种种经典选读与文史哲专题，则回归到（外系）选修及通识科目当中；现在认为需要维持“大学国文”必修一方，认为大学需要确保学生有文化素养和思辨能力等要求，其实属全人教育的一部份，可以透过通识科目的分类划分、学生需要最少在多少个通识分类中修读过多少学分等方法去处理，而具体方案则应由师生讨论决定。我相信，不少学系皆有能发展出增进文化素养和思辨能力，以及其他有助全人教育发展的科目。

进一步来说，我认为，台湾的教育需要认真区分语文教育、创意写作、翻译与文史哲专业——这些皆是不同范畴，不应混淆。专业作家、熟悉创意写作的教师，不代表可以教授实用文及学术文章的写作；在英语国家接受教育、研究英语文学与文化理论的研究者，不代表其自动可以训练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如果继续混淆语文教育和文史哲专业，要求文史哲专业的教师承担语文教育的责任，对师生都不是好事。

岑学敏，生于香港，英国伦敦大学文化研究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曾任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助理教授，现任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助理教授。